

曲阜孔府的禮樂戶

張詠春

提要

曲阜孔府的禮樂戶肇始於宋元，清亡後曾一度得存遺緒，是封建國家中央一級禮樂戶之外的典型案例，是隸屬於孔府衍聖公的一個「非賤民」身份的專業樂人群體。他們以承應欽頒文廟釋奠禮樂為基本職能，服務於闕里孔廟的丁祭大典。與其他地區、不同級別的禮樂戶相比，曲阜孔府的禮樂戶既符合禮樂戶之共有特徵，又自有其特殊性。

關鍵詞：禮樂戶；孔府；文廟釋奠禮樂

所謂「禮樂戶」是指萌發於北宋，雛形具於金，成型於元，在明清時期得到繼承延續，至清亡以後解體的一個出身於「非賤民」階層，專門承應祭壇之上的壇廟吉禮禮樂¹，與樂戶在社會身份、社會對待、行使職能等方面有明顯區別的群體。金代的太常禮樂人是「禮樂戶」的雛形，元代「禮樂戶」的出現標誌著這個群體的基本形成，因此用元代的官方稱謂——「禮樂戶」來命名這個樂人群體。明清兩代的樂舞生具備元代禮樂戶的基本特徵，是元代禮樂戶的後繼者。

曲阜孔府的禮樂戶（以下簡稱「孔府禮樂戶」）肇始於宋元，清亡後曾一度得存遺緒，是封建國家中央一級禮樂戶之外的典型案例，是隸屬於孔府衍聖公的一個「非賤民」身份的專業樂人群體。他們以承應欽頒文廟釋奠禮樂為基本職能，服務於闕里孔廟的丁祭大典。

一、孔府禮樂戶的歷史沿革

封建國家設置禮樂戶的理念，淵源有自。形成「非賤民」身份禮樂戶的時代，已然存在著一個「賤民」身份的專業樂人群體——樂戶，設置禮樂戶正是為了與樂戶相區別，並且取代原由樂戶承應的特定官方禮樂職能。因此，梳理禮樂戶的分支之一——孔府禮樂戶的歷史沿革，就需扼要回顧禮樂戶的設置淵源及禮樂戶從萌發至形成的歷史過程。

1 「壇廟吉禮禮樂」是以鐘磬樂懸為標誌，採用綜合表演形式，主要用於重大壇廟吉禮的祭祀主程序，還用於宮廷中朝會、宴饗等其他國家禮儀的禮樂。祭壇之上，由禮樂戶承應的「壇廟吉禮禮樂」包括郊社雅樂（郊社吉禮禮樂）、宗廟雅樂（宗廟吉禮禮樂）和祭孔雅樂（文廟釋奠禮樂）等。參見張詠春，《中國禮樂戶研究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頁8。

1. 禮樂戶的萌發²與形成

禮樂戶的設置理念淵源自周代以貴胄子弟接受樂教，並且用這部份「國子」參與國家祭祀禮樂的文化傳統：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鹹、大韶、大夏、大濩、大武。³

兩周以降，職業樂工的社會身份逐漸被鎖定爲「賤民」。但是，區分壇廟吉禮執事者「良」「賤」身份、強調以出身「高貴」「純潔」之「國子」演習官方祭祀樂舞的觀念並未中斷。

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⁴

以北魏時期明確規定樂籍制度爲標誌，封建國家職業樂工的「賤民」身份及其遭受的社會歧視以制度化的形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我們通常稱這個基本處於「賤民」階層的樂人群體爲「樂戶」。從樂戶的處境來看，這個群體的「賤民」身份及隨之而來的壓迫與歧視均由官方制度予以嚴格規定，不經特許，不得豁免。作爲低賤身份群體，他們被嚴格地隔離在封建國家平民階層以外，在刑訟、婚配等諸多方面處處低人一等，爲世人所輕賤。樂戶的「賤民」身份以及從事的「賤工」職業還具有連坐、繼承的特點，一人爲樂戶，舉家皆沒入「賤籍」，子孫世代從事「賤業」。⁵

禮樂戶萌發之前，即便是擁有太常、教坊、梨園、樂營、府縣教坊等多層次樂籍管理培訓機構的唐代，在「賤民」樂戶完全能夠滿足宮廷、軍營、寺廟、地方官署等不同層面用樂需求的情況下，排斥「賤工」、吉禮用「國子」的觀念仍然存在。

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蕞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⁶

北宋後期，在個別官方壇廟吉禮場合，以儒學生員代行樂戶之事，承應壇廟吉禮的登歌大樂，這標誌著禮樂戶的萌發。然而，這項政策最初的推行並不順利。

2 參見張詠春，《「禮樂戶」的萌發——北宋後期的生員奏大樂》（《天籟》，2009年第1期），頁7-14。

3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42，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711-1725。

4 清·孫詒讓，《周禮正義》，卷44，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814。

5 樂籍制度至清雍正年間方被禁革。參見項陽，《山西樂戶研究》，第一章（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6 唐·杜祐，《通典》，卷147，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72。

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恥於樂舞與樂工爲伍、坐作、進退。⁷

大觀四年的生員抵制演習文廟釋奠禮樂⁸事件充分證明，囿於固有良賤觀念，「國子生」們以與「賤民」樂戶合練合演爲恥。那麼，既然覺得樂戶「不配」與生員同場表演，爲何不讓這些生員完全替代樂戶在該場合的職能呢？於是，在封建國家的強力推動下，以儒學生員承應文廟釋奠禮樂的政策終於自上而下地推行開來。政和六年，曲阜孔府得到了宋王朝頒賜的「正聲大樂」及禮器，用於闕里祭孔。不過曲阜孔府並非唯一受賜者，按照規定，「天下節鎮州縣學皆賜堂上樂一副、正聲樂曲十二章，春秋上丁釋奠則學生登歌作樂」⁹。

金滅北宋，當南宋朝廷還在延續「春秋上丁釋奠則學生登歌作樂」的做法時，金章宗承安年間，已然創設「太常禮樂人」。金代「太常禮樂人」的設立，首次把出身「非賤民」者納入職業樂人編制，在樂人群體社會身份的「良」、「賤」分類方面作出了制度化的嘗試，爲禮樂戶在元代的形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模式。蒙元立國初期，著意收編故金太常禮樂人。元太宗十年，窩闊台採納衍聖公、故金太常博士孔元措的奏議，收集故金太常禮樂人，把他們連同家屬統統集中在東平。東平的禮樂戶隊伍自此建立起來，他們由孔元措管領，其生活保障由東平路地方守臣負責提供¹⁰。不過，直到元世祖至元三年遣散東平禮樂戶之前，駐在東平的禮樂戶並不完全是「東平的」，他們是蒙元立國初期的第一批太常禮樂戶。由此開始，禮樂戶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服役於封建國家中央朝廷的職業樂人完成了從一個群體向兩個群體的分立，並且把這種分立原則自中央向地方推行，形成地方一級的禮樂戶。¹¹

關於「禮樂戶」的特徵，有兩個基本設置原則決定了該群體與樂戶的區別：其一是社會身份的「良」「賤」區分以及由此帶來的政策保障、法令規定、物質待遇、社會評價等多方面的不同，其二是承擔的職能不同於樂戶。具體來說，禮樂戶具備「非賤民」的社會身份，在社會對待方面得到國家政策的保障，能夠免遭世人的歧視；爲國家重大吉禮祭祀活動承應壇廟吉禮禮樂是禮樂戶的基本職能，在這個基本職能之下，禮樂戶內部又有奏樂（含歌唱和不同樂器的演奏）和舞蹈的職能分工。除樂、舞的職能分工外，以明清時期設置於京城太常的禮樂戶爲代表，其內部還存在贊禮、捧帛、執爵、司尊、燒香等多項行禮職能的區分。¹²

7 元·脫脫，《宋史》，卷129（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003。

8 此為北宋後期用於文廟釋奠吉禮的登歌大樂。

9 清·杜詔，《山東通志》，卷11之3，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3。

10 明·宋濂，《元史》，卷68（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1691。「亡金知禮樂舊人，可並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

11 關於金、元之際禮樂戶的形成，參見張詠春，《由「太常禮樂人」到「禮樂戶」——金元之交「禮樂戶」的形成》（《中國音樂學》，2008年第4期），頁49-55。

12 關於禮樂戶的「非賤民」身份等群體構成特徵，以及孔府禮樂戶所受待遇，詳見參見張詠春，《中國禮

2. 孔府禮樂戶的形成

元代禮樂戶的形成與曲阜孔府有著密切的關聯。北宋、金兩代，曲阜孔府均得到封建王朝欽頒文廟釋奠禮樂，由孔氏族人、儒學學生為曲阜孔廟的丁祭典禮表演欽頒登歌大樂。衍聖公孔元措在金代任職太常博士¹³，對金代國家禮樂非常熟悉。蒙元立國初期，元太宗下令收集故金太常禮樂人，就是採納了衍聖公孔元措的奏議。孔元措不僅是建議的提出者，更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把收攏的前代樂工帶回自己的故鄉曲阜，他親自主持收集前代樂器、文獻的工作，他還向蒙元統治者力薦有用之材。總之，處於元代東平路轄區內的曲阜孔府擁有較為深厚的禮樂積澱，以「非賤民」承應文廟釋奠禮樂早已形成慣例，加之衍聖公孔元措的個人因素，從而為蒙元立國初期禮樂戶集聚於闕里孔廟、形成於東平鋪平了道路。

從元太宗十年（1238年）起，至晚到元憲宗五年（1255年），在長達近二十年的歷史時段內，曲阜是蒙元王朝太常禮樂戶的常駐地，曲阜孔廟是太常禮樂戶演習禮樂的地方。這一時期，由於曲阜孔府保存有前代欽頒的文廟釋奠禮樂，衍聖公孔元措利用自己故金太常官員的身份招攬舊部，有意把禮樂戶肄習禮樂的地點置於闕里孔廟，在保證禮樂戶日常演習活動的同時，還滿足了闕里孔廟丁祭大典對於文廟釋奠禮樂的需求。

元太宗十年，把所收「非賤民」身份的故金太常禮樂人置於東平管轄的曲阜。元太宗十二年「始命制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¹⁴。元憲宗二年，詔東平的太常禮樂戶赴日月山應差執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¹⁵同年，東平地方守臣開始興建新的東平府學，元好問為此撰寫了《東平府新學記》。新府學完成於元憲宗五年，竣工後，原駐曲阜的太常禮樂戶遷出曲阜，改駐東平路的治所東平——「歲時閱習以宿」¹⁶。

太常禮樂戶遷出曲阜數年後，元世祖中統三年，「辛卯，嚴忠範奏請補東平路廟學太常樂工，從之」¹⁷。如果說遷出曲阜之前，為孔府衍聖公承應文廟釋奠禮樂者是駐在曲阜的太常禮樂戶，那麼，這時的執事者，仍然可能是太常禮樂戶。即，這一歷史階段，尚未形成孔府的禮樂戶，為孔府衍聖公春秋家祭服務的禮樂戶是中央一級的太常禮樂戶。顯然，太常禮樂戶是不屬於孔府管轄的。

鑒於為京城內重大壇廟吉禮服務的太常禮樂戶原則上應當常駐於統治中心，因此，

樂戶研究的幾個問題》，第二章（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

13 元·脫脫，《金史》，卷14（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14。

14 明·宋濂，《元史》，卷68（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1691。

15 明·宋濂，《元史》，卷68（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1691-1692。

16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2，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59。

17 明·宋濂，《元史》，卷5（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87。

隨著時局的穩定，其繼續以東平為基地愈發显得不合時宜。以至元三年發生的遣散東平來京禮樂戶事件為標誌，元世祖至元年間，太常禮樂戶逐漸回遷京城。

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戶道遠資糧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戶，餘遣之……¹⁸

太常禮樂戶回遷京城多年後，缺乏封建國家的特殊關照，闕里孔廟的文廟釋奠禮樂演、訓活動漸呈衰落之象。元代儒士王奕的《祖庭觀丁歌》描繪了至元二十六年八月闕里孔廟禮行樂作的盛大場面¹⁹，然而，時至元武宗特命置登歌樂於孔府以前，曲阜孔廟的丁祭大典已呈現出蕭條景象——「闕里宣聖祖廟，釋奠行禮久闕，祭服登歌之樂，未蒙寵賜」²⁰。

元武宗至大三年，頒賜登歌樂於曲阜孔府，元代孔府的文廟釋奠禮樂演、訓活動重又步入正軌。元仁宗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聖廟置雅樂，選擇習古樂師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²¹。這一詔命強調指出，地方一級禮樂戶應來源於當地的儒學學生，他們的基本職能是以「釋奠大成之樂」服務於當地的文廟釋奠吉禮。元仁宗的詔命下達時，尚不清楚孔府是否已擁有屬於自己的禮樂戶群體。兩年後，元仁宗下詔，在孔府設置「司樂」官員，孔府的文廟釋奠禮樂管理機構正式建立——「七年……是年為聖廟設司樂一員」²²。延祐年間孔府文廟釋奠禮樂管理機構的建立從另一方面證明：當時的衍聖公已經擁有了一支真正歸屬於孔府管轄的專業樂人群體——曲阜孔府的禮樂戶。

3. 孔府禮樂戶的延續與解體

元王朝覆亡後，禮樂戶的設置原則得到延續。明清時期的禮樂戶一般被稱為「樂舞生」，這個群體繼承了前代禮樂戶的基本特徵，作為封建國家重大壇廟吉禮的禮樂執事者，他們具有「非賤民」社會身份，享受正常民戶待遇，甚至能得到一定的特殊優渥。

洪武二年，首次出現了有關孔府樂戶的明確記載，當年的聖旨詔命欽賜孔府樂戶26戶：

中書省咨進，准江淮行省平章韓榮祿咨為林廟灑掃戶、女戶、樂戶事，該照田平章榜文收集灑掃廟戶一百戶、樂戶二十六戶，尼山廟元設一十五戶，另有石碑可考，雖有舊典增減，准否例從，女戶、樂戶不見歷代載籍明文……²³

18 明·危素，《說學齋稿》，卷2，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81-682。

19 元·王奕，《玉門山人集》，卷1，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30-631。《祖庭觀丁歌》：「金絲堂前班引出，笙鏞隱隱金石聲。……太常金樂交供奉，秩秩蓬豆環簪纓。」

20 明·宋濂，《元史》，卷68（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1698。

21 同上：頁1699。

22 清·杜詔，《山東通志》，卷11之3，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6。

23 孔府明洪武二年聖旨石碑碑文節選，引自張詠春，《孔府的樂戶和禮樂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

欽賜「賤民」樂戶之後，洪武七年，又定孔府樂舞生人數，給與遴選出的「非賤民」孔府樂舞生「優免」待遇，頒賜太常樂器。於是，曲阜孔府同時擁有著樂戶和禮樂戶的編制：

洪武七年十一月奉旨，造送宣聖廟樂器、祭器、法服，各給一副，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於府州縣儒學生員內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備行准取到濟寧、曲阜等州縣樂舞生張濤、陳慶等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習演樂舞……俱照廩膳生員例，除本身優免，仍免本人戶二丁。²⁴

清代延續了明代孔府禮樂戶（樂舞生）的設置。按順治年間規定，孔府樂舞生選自民間俊秀子弟，在待遇方面可照廩生例，得以優免丁差。

清順治元年……題請聖廟祭祀額設樂舞二百四十名於州縣俊秀儒童選取，照廩膳生員例一體優免，仍免本家二丁……²⁵

清亡以後，傳統意義上的禮樂戶解體，但禮樂戶模式在部份地區仍一度存有遺緒。在山東曲阜，大約於民國十年左右，成立了由孔府獨立籌辦的古樂傳習所，校長是末代衍聖公孔德成²⁶。孔府古樂傳習所的性質為孔府的私立學校，辦學的目的是保持一支相當規模的「樂舞生」隊伍，為闕里孔廟的丁祭典禮服務，選拔的「樂舞生」皆來自身世「清白」的平民子弟。古樂傳習所設有主任、副主任和各門課程的教師，教授的課程可分為文化課和樂學課，共有二十多門，其中，樂學課的內容與文廟釋奠禮樂直接相關。古樂傳習所的音樂教師由孔府從外面聘請，或者從古樂傳習所早期學員中擇優留用。²⁷

二、孔府禮樂戶與文廟釋奠禮樂

中國傳統文化是崇尚「禮樂」的文化，「禮樂」體現著國家的等級秩序和制度規範。關於西周以來的禮制，影響最為廣泛的是「五禮」（吉、凶、嘉、軍、賓）分類法。「五禮」之中，吉禮（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林澤、社稷、五嶽、先師等祭祀之禮）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吉禮祭祀活動是封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所謂「壇廟吉禮禮樂」是以鐘磬樂懸為標誌，採用綜合表演形式，主要用於重大壇廟吉禮的祭祀主程序，還用於宮廷中朝會、宴饗等其他國家禮儀的禮樂。秦漢以降，以金石重器作為標

2005年），頁13。

24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3，刻本，1711年。

25 清·孔尚任，《聖門樂志》，影印光緒十三年重刊本，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頁242-243。

26 孔繁銀，《衍聖公府見聞》（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頁69。另參見苗晶，《孔廟祭禮音樂的調查情況報告》（北京：音樂研究所藏1961年油印本）。通過採訪曲阜李家店村桂子和，可知：「於1920年孔府內成立了雅樂傳習所，招考了二十人學習……學習四年畢業……1924年又辦第二期招收學員四十人，由桂子和等擔任教授」。

27 參見張詠春，《孔府的樂戶和禮樂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2005年），頁64-69。

誌器的壇廟吉禮禮樂是帝王身份的象徵，原則上只用於統治中心，改朝換代之際往往必須重新審訂。北宋以來，封建國家為彰顯尊師崇儒之意，允許各地官府於文廟釋奠吉禮場合使用鐘磬樂懸。於是，掌於太常的壇廟吉禮禮樂下發至各地官府，由此開文廟釋奠禮樂上下相通之先河。

金、元易代之際，禮樂戶形成，於文廟釋奠吉禮場合奉上文廟釋奠禮樂，成為禮樂戶群體的重要職能之一。封建國家於曲阜孔府設置禮樂戶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保障闕里丁祭典禮的正常舉行，為闕里丁祭承應經過官方認可的文廟釋奠禮樂，是孔府禮樂戶的基本職能。

1. 孔府禮樂戶的基本職能與管理機構

在禮樂戶形成之前，北宋、金兩代，封建國家皆欽賜壇廟吉禮禮樂於衍聖公所在的曲阜孔府。同時規定，以「非賤民」身份者承擔文廟釋奠禮樂的表演任務。這一歷史階段，已不難發現未來孔府禮樂戶職能之端倪。北宋徽宗崇寧五年，下詔頒發大晟新樂於各地²⁸。考慮到兗州曲阜縣是孔子故里，政和六年，特頒賜禮器、樂器於闕里。

六年五月詔，遣宣教郎孔若穀頒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²⁹

金章宗明昌六年，應衍聖公奏請，皇帝下詔賜曲阜孔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並且派遣太常舊工赴曲阜教習登歌樂，曲阜孔府再次得到合乎欽定規範的壇廟吉禮禮樂。這裡，無論孔氏族人，還是曲阜縣學學生，其有別於樂戶的「非賤民」身份都是確定無疑的。

衍聖公奏……乞頒降大樂，許內族人及縣學生咸使肆習，並乞降禮器以備釋奠及家祭使用。至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³⁰

賜衍聖公……登歌一部，仍遣太常舊工往教孔氏子弟，以備祭禮。³¹

作為孔子後人、襲封衍聖公，就封於曲阜孔府的孔氏嫡長後裔需要維持一個較為穩定的禮樂戶編制，以便為闕里孔廟丁祭典禮執事應差。曆元、明、清三代，曲阜孔府的禮樂戶編制得到長期延續。蒙元立國初期，集聚於東平的太常禮樂戶一度是闕里文廟釋奠禮樂的承應者。而隸屬曲阜孔府的禮樂戶，其管理層最早出現於元仁宗延祐七年，主

28 元·脫脫，《宋史》，卷129（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002。又詔曰：「樂作已久，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帥府。」

29 清·杜詔，《山東通志》，卷11之3，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3。

30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卷121，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33。

31 清·杜詔，《山東通志》，卷11之3，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4。

官爲司樂一員³²。

明代孔府樂舞生的基本職責仍然是爲闕里孔廟丁祭承應欽頒的文廟釋奠禮樂，明代孔府衍聖公屬下的樂舞生，其管理層的建置年代較早。如上一節所述，由於元代禮樂戶起步於東平，演習於曲阜闕里孔廟，太常禮樂戶遷京後，元代的曲阜孔府專設有司樂官，存在孔府禮樂戶的建制，故使得明代孔府樂舞生之組織便於因循舊例³³。

洪武元年，在徐達、常遇春的征北大軍平定山東之後不久，即定衍聖公之屬官，其中包括「司樂」一職——洪武元年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³⁴。

清沿明制，仍於孔府設立司樂、遴選樂舞生，同時還保留了孔府「賤民」樂戶的編制。清代孔府樂舞生的職能不僅僅是爲闕里孔廟丁祭承應欽頒的文廟釋奠禮樂，根據清代孔府檔案記載可知，孔府樂舞生還曾直接服務於曲阜縣所在之兗州府，孔府樂舞生爲兗州府學文廟丁祭承應禮樂，由兗州府出資酬勞：

昨八月丁祭，兗州府太爺提取（曲阜孔府）樂舞生六十名（樂舞生的頭領名叫魏士美）到府，文廟演樂供祭已畢。蒙太爺賞銀十兩……³⁵

總明、清兩代，孔府的公府管理機構主要爲百戶、管勾、司樂、典籍、知印、掌書六廳，負責管理孔府樂舞生的是其中的司樂廳³⁶。從元代的司樂官到明清時期的司樂廳，孔府禮樂戶的專職管理機構可謂建置完備。

據文獻記載，明清時期的孔府不僅有禮樂戶的編制，還按制得到封建國家欽撥的樂戶，不過，孔府樂戶的管理與司樂廳並無關係。明清時期，孔府司樂廳管理孔府禮樂戶（樂舞生），孔府樂戶則統歸孔府百戶廳³⁷管轄。可見，在曲阜孔府，管理孔府禮樂戶的機構與管理孔府樂戶的機構之間不相統屬。通過司樂廳與百戶廳所管轄人員之不同，明確地呈現出孔府禮樂戶（樂舞生）與屬於僕役階層的孔府樂戶在社會地位方面的差異性。

32 同上：頁526。

33 明初文廟釋奠一度沿用元代舊樂，直到洪武二十六年才向各地頒發新制文廟釋奠禮樂。其間，爲孔府釋奠吉禮表演元代舊樂的樂人有可能仍然是故元的孔府禮樂戶，也就是說，承載著元代祭孔舊樂的孔府禮樂戶影響著明初孔府的祭孔奏樂活動，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明王朝爲孔府專設樂舞生以前。明王朝最早於孔府設置「樂舞生」是在洪武七年，至於這些經過遴選的「民間俊秀子弟」里面是否包括前代的禮樂戶或由其後人繼承，我們既無法給予確切的結論，也不能排除其可能性。參見張詠春，《孔府的樂戶和禮樂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2005年），頁45。

3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明太祖實錄》，卷36上，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抄本微卷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頁665。

35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頁266-267。

36 何齡修、劉重日、郭松義、胡一雅、鍾遵先、張兆麟，《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62。

37 同上：頁65。「孔府百戶廳主要負責管轄護院家丁，催征丁銀，管理樂戶等身份較為低下的人戶。」

清代的孔府樂舞生中，為便於管理，還設有「頭領」「學長」「班長」等職。如原樂舞生頭去職或病故，新樂舞生頭領由其他樂舞生通過「公舉」產生，新的人選被批准後，張榜公示。在康熙九年的一樁訟案中記載：「因舊頭趙運開病故，有樂舞生翟守乾等公舉三人……揀選得魏士美應頭，又公舉到縣，有縣示張掛西華門下」。但「公舉」過程中似有舞弊現象，舞弊者被其他樂舞生揭發：「據王永安等十八人俱稱，並不曾公舉魏士美」。因此，孔府批文中說：「據供魏士美不曾公舉應頭，……其應換頭領二名，著令樂舞生公舉來委用。」³⁸

2. 同中有異——孔府禮樂戶的特殊性

就禮樂戶的一般特徵而言，該群體具有「非賤民」身份，享受封建國家正常民戶的待遇，承應欽定的壇廟吉禮禮樂。與其他地區、不同級別的禮樂戶相比，孔府禮樂戶既符合禮樂戶的一般特徵，又自有其特殊性。

從禮樂戶群體的建制方面看，經歷改朝換代，曲阜孔府的禮樂戶群體仍能保持相對良好的延續性。以明代孔府禮樂戶（樂舞生）為例，明王朝除賜予各親王樂舞生³⁹以外，至於公侯一級，依目前所見，能夠長期擁有樂舞生編制者唯有就封於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的孔府衍聖公。在京城太常樂舞生之外，明代的各親王擁有隸屬於本王府的樂舞生，很多地方官府也設有樂舞生。但是，隨著諸王藩國的廢立、地方官府支持力度的變化，甚至是改朝換代的大變動，孔府以外的樂舞生群體或存或廢，變化頻仍。面臨這些情況，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孔府司樂機構和樂舞生的建制得到相對良好的保存，享有封建國家「優免」待遇的孔府禮樂戶（樂舞生）群體得以延續至清末。

從禮樂戶的職能方面來說，孔府禮樂戶承應文廟釋奠禮樂的職能亦有其特殊性。曲阜是除京城以外，舉行文廟釋奠吉禮的另一個中心地區。自北宋政和六年以來，為保證闕里文廟釋奠禮樂的表演質量，曲阜孔府多次得到封建國家欽頒的文廟釋奠禮樂。鑒於「闕里祖庭」的特殊地位，闕里孔廟每年舉行隆重的丁祭典禮，禮行樂作的全過程常常要接受來自各地官民的「觀禮」，這樣對孔府禮樂戶演、訓質量的要求就更為嚴格，容不得有半點閃失。因此，與京城之外的禮樂戶相比，元、明、清三代，孔府禮樂戶不僅能夠在文廟釋奠禮樂演、訓方面得到中央禮樂機構直接派員教習的特別關照，還多次被召入京城接受規範化培訓。⁴⁰

就孔府禮樂戶對曲阜以外地區的影響而言，如上文所述，由於該群體能夠更多得到中央禮樂機構的專門培訓，以遵循國家欽定文廟釋奠禮樂為原則，該群體的文廟釋奠禮樂演、訓質量較各地方官府所行者更顯規範。於是，孔府禮樂戶及其承應的文廟釋奠禮樂完全具備成為各地學習範本的條件。以清代為例，康熙二十五年，同在山東的濟南府

38 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頁268-269。

39 徐溥等撰、李東陽等重修，《明會典》，卷54，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88。「洪武初定，凡王國宗廟樂生三十六人，……舞生七十二」

40 參見張詠春，《中國禮樂戶研究的幾個問題》，第四章第二節（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

地方行政主官與學官，從曲阜孔府延請教師12人以教習濟南府樂舞生：

……禮聘聖府教習十二名，館之於學。集所選青俊儒童二百四十人，分部教演，……幾一年，所乃於八音諸器，皆粗能會於心而應於手。……其始終條理，則本之闕里也……⁴¹

孔府禮樂戶對外地禮樂戶的指導不局限於齊魯大地。康熙年間，浙江杭州府專門延請孔府禮樂戶前往教習。嘉慶年間，浙江巡撫阮元咨請孔府，又調孔府司樂官及孔府禮樂戶「學內學長、班長」5人來杭州府教習文廟釋奠禮樂。

我浙釋奠樂沿明制……康熙二十九年，大中丞張核考典制，……移咨曲阜聘師教習，聲容至是乃備。⁴²

言及撫浙時曾咨公府調取司樂、學內學長、班長五人來杭教習樂舞，……以隆祀先師煌煌鉅典，凡在土類有事為榮。⁴³

道光十五年，湖南長沙府醴陵縣官紳士人募集費用以供本縣文廟釋奠吉禮所需。為置備本縣文廟釋奠禮樂，醴陵縣還派遣藍鐘瑞等生員不遠千里赴曲阜學習欽頒禮樂定制，藍鐘瑞等歸來後編成《文廟丁祭譜》。顯然，類似醴陵縣這樣的地方一級禮樂戶是絕無可能得到封建國家中央禮樂機構專門培訓的，這種情況下，正需要孔府禮樂戶以其熟習的欽頒文廟釋奠禮樂，為提升地方一級禮樂戶的文廟釋奠禮樂表演質量，發揮應有的作用。

道光乙未歲，邑人士始募於眾為兩丁祀。每歲春秋，除學官照常領辦祭品外，其餘樂舞一切均由祀辦，用襄盛典。己亥冬，恭謁闕里，考求定制，凡典章度數敬謹遵行。⁴⁴

41 清·孔貞瑄，《大成樂律全書》，影印中國音樂研究所藏康熙五十二年孔尚先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

42 清·金之植、宋鉉，〈《文廟禮樂考》〉，樂部，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頁463。

43 清·藍鐘瑞，〈《文廟丁祭譜》〉，卷4之1，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頁861。

44 清·江普光，《醴陵縣志》，卷5，刻本，1870年。

參考文獻

- [1]唐·杜祐，《通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2]金·元好問，《遺山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3]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4]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5]元·王奕，《玉門山人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6]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7]明·危素，《說學齋稿》，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8]明·徐溥等撰、李東陽等重修，《明會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明太祖實錄》，據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抄本微卷影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
- [10]清·杜詔，《山東通志》，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11]清·江普光，《醴陵縣志》，刻本，1870年。
- [12]清·金之植、宋，《文廟禮樂考》，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
- [13]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刻本，1711年。
- [14]清·孔尚任，《聖門樂志》，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
- [15]清·孔貞瑄，《大成樂律全書》，影印中國音樂研究所藏康熙五十二年孔尚先刻本，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
- [16]清·藍鍾瑞，《文廟丁祭譜》，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9年）。
- [17]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18]清·孫詒讓，《周禮正義》，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19]苗晶，《孔廟祭禮音樂的調查情況報告》（北京：音樂研究所藏1961年油印本）。
- [20]何齡修、劉重日、郭松義、胡一雅、鐘邊先、張兆麟，《封建貴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 [21]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濟南：齊魯書社，1988年）。

- [22]孔繁銀，《衍聖公府見聞》（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
- [23]項陽，《山西樂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 [24]張詠春，《孔府的樂戶和禮樂戶》（濟南：山東師範大學，2005年）。
- [25]張詠春，《中國禮樂戶研究的幾個問題》（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08年）。
- [26]張詠春，《由「太常禮樂人」到「禮樂戶」——金元之交「禮樂戶」的形成》（《中國音樂學》，2008年第4期）。
- [27]張詠春，《「禮樂戶」的萌發——北宋後期的生員奏大樂》（《天籟》，2009年第1期）。

